

钧瓷系与禹州钧窑

张玉霞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2)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porcelain series is advanced than the kiln series, and can be used more popular. The Jun porcelain series appeared in the late North Song Dynasty and disappeared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Jun kiln sites in Yuzhou city, such as Juntai and Liujiamen sites, maybe the official kiln of Bianjing.

Key words: Jun porcelain; porcelain series; kiln series; official kiln of Bianjing

摘要: 瓷器研究中,“瓷系”的概念比“窑系”在某些时候显得更为合理。钧瓷系产生于北宋末年,并一直延续至清代,而禹州钧台、刘家门等钧瓷系窑址很可能就是北宋的汴京官窑所在。

关键词: 钧瓷; 瓷系; 窑系; 汴京官窑

钧窑被添列为“宋代五大名窑”是近现代才完成的事情,但钧瓷系瓷器却以“入窑一色,出窑万彩”的神奇窑变赢得了人们的长期喜爱;同时,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中唯一一个直到明代的文献中才直接出现记载的瓷系,其身世受到了广大陶瓷考古专家们的热烈讨论和研究。钧瓷系研究的范围涉及很广泛,包括年代、性质、范围等多个方面。本文在诸多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钧瓷系的内涵与时间范围,禹州钧窑遗址的性质与年代等内容进行阐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钧瓷系的内涵

现在对于宋代主要烧造某些相同特征瓷器的诸窑口,学术界惯以“窑系”称谓。“一种瓷器在市场上受到欢迎,首先是邻近瓷窑的相继仿制,继之就是瓷窑的增加与窑场的扩大,形成瓷窑体系。”^①陶瓷史家“即用特征较明显的一类产品将许多窑址串联起来,用来概括在一定的区域内、生产相同面貌瓷器的众多窑场。凡生产这类产品的窑址,都称为××窑系。”^②可见,“窑系”是以“窑场”为出发点来命名的。具体到“钧窑系”,就是指主要生产钧瓷器的窑场的集和。在陶瓷考古研究中,“窑系”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归纳、概括的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但瓷器研究,不是仅研究烧造某类产品的窑址本身,也不是仅研究窑址内出土的瓷器,而是涉及

到了窑址、墓葬、地层等各种遗迹单位出土的遗物以及传世品,此时,“窑系”的概念就显得力不从心和以偏概全了。此前,刘涛和秦大树等先生均已对“窑系”的概念提出了质疑。^③我们也觉得“窑系”无法准确表达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拟以“瓷系”替代之。

“瓷系”的概念在《中国陶瓷史》中即已提出。该著作在论述宋代的六大瓷窑体系时,其中就包含“南方地区的龙泉青瓷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④。但这时的“瓷系”还是纳入在“窑系”的概念之中,实则是“窑系”的别称。本文的“瓷系”,指的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瓷器及出土这些瓷器的单位的集和,是以瓷器为出发点来概括和命名的。具体到钧瓷系瓷器的共同特征,可从考古发现、传世器及文献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据1973~1974年^⑤和2001~2002年^⑥分别对禹州(原禹县)钧台窑、刘家门窑等遗址的发掘可知,钧瓷系瓷器釉色主要有天青、豆青、月白、紫红、碧蓝、米黄、天蓝、红紫斑等;传世器主要为一些博物馆所藏,釉色主要为海棠红、天青、玫瑰紫、月白、天蓝、红紫斑等;文献记载其釉色有天青、月白、朱砂(胭脂)红、玫瑰(茄皮)紫、葱翠青等。《中国陶瓷史》做出了归纳性描述“钧窑属北方青瓷系统,钧窑瓷器独特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乳浊釉,釉内还含有少量的铜,不同于耀州窑,也不同于汝

窑,烧出的釉色青中带红,有如蓝天中的晚霞。青色也不同于一般的青瓷,虽然色泽深浅不一,但多近于蓝色,是一种蓝色乳光釉,是青瓷工艺的一个创造和突破。”^⑦综而言之,钧瓷系瓷器釉色属于北方青瓷系统的蓝色乳光釉,因釉内含有铜而常显现出蓝、红、紫等窑变色,外观上则多有紫口铁足、蚯蚓走泥纹等特点,这些为钧瓷系瓷器的主要特征。钧瓷系,也就是具备这其中某种釉色、外观等方面特征的瓷器及出土这类瓷器的遗迹单位的总称。这些特征在其他瓷系的瓷器身上也可能出现,但若加以注意,在具体的细微之处仍可予以区分。同时,钧瓷系瓷器的特征因时代、供给对象不同亦有不同的变化,不会囿于定式,这些特征也不一定全部出现。钧瓷系研究的对象,既包括钧窑系串联起来的生产钧瓷系瓷器的窑址,也包括所有的出土和传世钧瓷系瓷器以及出土该类瓷器的其他遗迹单位等。

钧瓷系的命名是以经科学考古发掘最早、遗址也最为典型的禹州钧台窑址而来,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或惯例相一致,正是我们提出“瓷系”概念的又一诱因。禹州于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因当地有夏之钧台而改称“钧州”,明清及至当今陶瓷文献中均认为钧瓷系瓷器出于禹州,并以“钧(均)窑”称之,本文也顺此称具有上述特征的瓷器为“钧瓷系”瓷器。不用“窑系”而提出“瓷系”概念,并不是要以后者代替前者,而只是对前者的一种推行。后者虽然包括前者,但并不能完全代替前者,两者各擅胜场,可灵活运用。

二、钧瓷系存在的时间界定

钧瓷系是何时产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又存续至何时?学界对此多有讨论,众说纷纭。我们认为:钧瓷系产生于北宋末年,并一直延续至清代。有以下两方面的证据。

1. 考古发现最早的钧瓷系瓷器属于北宋末期

关于钧瓷系的记载,直到明代的文献中才直接出现,但并未说明其烧造年代。到了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载“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⑧《陶雅》载“钧窑,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号钧台,讹作均,相沿已久。”^⑨始说明其为宋初所烧。在文献记载缺乏而又争议颇大的情况下,经科学发掘的考古资料对判定钧瓷系出现的年代无

疑更具说服力。钧瓷系窑址的主要发现和发掘地均在禹州。目前,经科学发掘的禹州钧瓷系窑址有钧台、刘家门等处。1973~1974年的发掘者认为“从这次发掘材料来看,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⑩但文中并未就此论断作出论证。2001~2002年的发掘者将刘家门窑址分为三期四段,其中,“第一期前段的时代定为北宋末期的徽、钦时期(1101~1127年)”。第三期后段的年代“为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元末(14世纪中期)”。发掘者认为“尽管现在无法证明刘家门窑的准确停烧时间,但推测应不会晚于明初。”^⑪此外,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的地层中,出土了一件钧瓷系瓷碗,天蓝釉有玫瑰紫斑。发掘者推测:该遗址应为北宋末年,在金人入侵的大火中被焚毁^⑫。在其他地区、其他窑址,尚未发现有经科学发掘的比上述发现更早的钧瓷系瓷器。因此,文献记载“钧瓷系”宋初烧造的观点,并没有得到考古发掘的验证,而刘家门窑址的发掘地层年代有钱币等作为佐证,洛阳衙署庭园遗址北宋晚期层位出土钧瓷系瓷碗,亦有相关遗存佐证,科学性更大一些。

2. 辽代境内未出土钧瓷系瓷器,说明北宋钧瓷存在时间不会太长

彭善国在《辽境出土陶瓷研究》一书中,对辽代境内出土的“输入瓷”进行了系统研究,其中属北宋朝的瓷器有耀州窑系、青白瓷系、定窑系及越窑系等,不见钧瓷系瓷器^⑬。我们知道,北宋与辽王朝在“澶渊之盟”后,息兵罢战,两国交往频繁,北宋致辽国使者的礼物繁多,瓷器有奁、瓶、盏、注、碗、茶盒子等^⑭。而且,早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双方即开始了榷场贸易,“澶渊之盟”后,发展更为迅速。在这种情况下,未发现钧瓷系瓷器,原因可能有二:其一,该类瓷器作为皇家专用品,不准作为货物交易;其二,可能因其在北宋朝存时较短,未能用于榷场贸易。据《宋会要辑稿》记载“真宗景德四年九月诏‘瓷器库除拣封樁供进外,余者令本库将样赴三司行入估价出卖。其漆器架阁收管,品配供应,准备供进及榷场博易之用。’”^⑮可见,第一种可能似难成立。“澶渊之盟”为1004年,如果说钧瓷系瓷器在此之前,甚至在此之后即有烧造,那么至辽亡的1125年大约有100多年时间,没有理由在这么长的时间内还没有将其作为商品交易。所以,第二种可能

更为合理,钧瓷系应该是在盟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的,即大概到了北宋的晚期。据这正反两方面的论述可知,钧瓷系开始出现的时间应在北宋末年。

关于钧瓷系退出历史的时间,一直到元代也应是没有什么大争议的。明清时其他窑址仿造的,只是时间、地点不同而已,瓷土成分也可能不同,但主要的釉色特征,所追求并达到的艺术效果大体应是一致的。那么,在考古学研究中,钧瓷系的延续可以到清代。

三、禹州钧瓷系窑址的性质与年代

目前所知,禹州为钧瓷系窑址发现最为丰富的地区,是钧瓷系瓷器烧造的中心地区。其中,1973~1974年发掘的钧台窑遗址遗物丰富,烧造精美,特征明显,与后来发掘的神垭刘家门等窑址共同成为钧瓷系的典型遗址。这里就禹州钧瓷系窑址的性质与年代问题作初步探讨。

(一) 禹州钧瓷系窑址即汴京官窑

1973~1974年的考古发现遗物与北京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地的北宋传世钧瓷系瓷器完全吻合,既为这些藏品找到了窑口,同时也确定了禹州钧台钧瓷系窑址的官窑地位。但由于明以前的文献中,尤其是宋代的文献中并无禹州作为官窑或者烧过贡瓷给北宋朝廷的记载,更有甚者,有些学者对传世陈设瓷及禹州钧窑址出土器物的年代也产生了怀疑,有了金代说、元代说甚至明代说等不同见解^①,这对禹州乃北宋钧官窑所在的论断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冲击。我们认为:禹州钧瓷系窑场不仅具有北宋的官窑地位,而且即是南宋叶真《垣斋笔衡》所记的汴京官窑所在。有如下五方面的证据。

1. 时间与空间的吻合

经考古发掘证实,禹州刘家门出土的钧瓷系瓷器属于北宋晚期,而据《垣斋笔衡》:“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②顾文荐《负暄杂录》:“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③综合考虑,则官窑的初烧年代为北宋徽宗政和年间,即1111年以后,属于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前段的时间范围。

空间方面,殷德铭《北宋京师自置官窑之谜探究》^④一文,对此进行了比较充分地论证。文章认为:今禹州市北宋时名阳翟县,归属颍昌府。而颍昌府为北宋京师南辅,为四辅郡之一,而“四辅郡”皆为国都所在地及其行政官置所

管辖地区,即皆为京师开封府所管辖的地区——皆属京畿之地”。所以,京师自置官窑的可能所在地域也应将辅郡地区包括在内。目前,在此范围内发现有窑址,而且产品又能够称得上官窑的,只有禹州钧台窑。所以,“这已表明钧台窑是基本符合‘同一辖域’这一基本构件的。”另据《老学庵笔记》载“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⑤而从文献记载和宫廷传世品中均知,北宋时决不是“惟用汝器”,应还有官、钧、哥、越等器。其中哥、越等可能因属贡瓷,非朝廷命造或自造,不予记述。但官、钧不计,颇不合理。我们推测,可能官、钧本为朝廷自造,更重要的是禹州本属京师所辖地区,所以在记载“入”宫的瓷器中,不含在内。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禹州地区为汴京官窑所在区域的可能。

2. 文献记载特征相合

《博物要览》载“官窑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州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疑为原文衍字一笔者注)足。……官窑质之隐纹如蟹爪,哥窑质之隐纹如鱼子……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鸟、麋豹等像。本于本色洶外变色,或黄或紫红,肖形可爱,皆文明。乃火之幻化,否则理不可晓。”^⑥《燕闲清赏笺》载“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二窑烧出器皿,时有窑变,状类蝴蝶禽鱼鳞豹等象,布于本色釉外变色或黄黑,或红紫,形肖可爱,是皆火之文明幻化,否则理不可晓,似更难得。”^⑦《古窑器考》载“宋政和间,徽宗于京师置窑烧造,曰官窑。土脉细润,色泽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又载“官哥二窑,于本色釉外,变或黄或红紫,状类蝴蝶禽鱼鳞豹,肖形可爱。火之幻化,时或有之。”^⑧《七颂堂识小录》载“官窑螭耳洗,宋修内司窑杯,直如筒,色如猪肝,皆北海物。”^⑨此“猪肝”色,实应与其他许多文献所载之“驴肝”色同。《文房肆考》载“官哥二窑,于本色釉外,变或黄或红紫,状类蝴蝶禽鱼鳞豹,肖形可爱。火之幻化,时或有之。”^⑩这些记载表明,至少在明代,即已有人将那些釉色或黄或红紫状类各种动物形象的器物定位为宋时的官窑作品了。除《古窑器考》外,其余所说

官窑均似指南宋官窑,但据现在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乌龟山郊坛官窑器“胎土呈黑灰以至黑褐色、胎较薄,施釉较厚,釉有粉青、炒米黄等多种色泽……”^②老虎洞修内司窑器釉色以粉青为主,米黄色次之,另有翠绿、灰青、浅紫等^②,二者均少见窑变釉色,与“时有窑变”的记载相悖,所以文献记载所指实应是“汴京官窑”。或言“袭故京遗制”,两宋官窑的釉色特征亦应一致,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的推测,亦有可能只是都设立有官窑的制度,而在产品上却未必一致。而后人错将汴京官窑之产品记作修内司窑所产。

由上述可知,官、哥二窑均有窑变色,釉色与禹州钧窑所出和传世品一致。只是据文献所载哥窑窑址当在浙江地区,地理位置上与禹州不符。《格古要论》载官窑“宋修内司烧者,土脉细润,色青带粉红,浓淡不一,有蟹爪纹,紫口铁足,色好者与汝窑相类”^③。上引官窑文献亦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虽然这不是钧瓷系瓷器的唯一特征,但同样也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于钧瓷系瓷器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蚯蚓走泥纹”,却少见记载,且多出现于艺术作品中,如寂园叟《汝窑托杯行》:“汝窑天下无……异纹蚯蚓走泥,禹均故相苦。”《均盆歌》载“均也汝也皆宋器,蚯蚓走泥迹已陈。”^④而据《长物志》:“官窑隐纹如蟹爪。”^⑤上引《格古要论》、《博物要览》、《古窑器考》等亦载官窑有蟹爪纹特征。我们认为所谓的“蚯蚓走泥纹”即指的文献中所说的“蟹爪纹”,只是予以艺术加工了。综上所述,文献记载的汴京官窑的瓷器特征与禹州钧瓷系瓷器的特征有诸多相合之处。

3. 宋代墓葬中未出土钧瓷系瓷器

宋代墓葬中至少少见钧瓷系瓷器出土,一部分人据此即认为北宋根本没有钧瓷系瓷器。事实上,据现在的考古发掘资料看,宋墓十室九空,盗掘非常严重,不能排除随葬而被盗走的可能。此外,我们认为还有两种可能,一是可能与其出现较晚有关,二是与其官窑的身份有关。官窑为皇家所有,社会流传必极少。墓葬中未出土钧瓷,恰反证了钧窑极有可能是北宋的官窑。

4. 宋元文献中未有钧瓷系的记载

宋、金、元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关于钧瓷系的相关记载。金元时期,历史文献中对其他窑址的记载亦所见不多,非独不载钧窑,并不能说明钧窑不存在。宋时不见记载,而对其他窑口却有

撰述,确实颇不正常。于是有学者推测是将钧窑当作其他窑口记载了,如秦大树等就认为,“真正的钧釉瓷很可能被许多文献当作汝窑介绍了”^⑥。但我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除了钧窑,还有唐、邓、越等窑,均已被识别出,所以才有了“汝窑为魁”的说法,为什么独独钧窑不能被识别出?尤其是钧窑的铜红釉色非常特殊,在汝窑中并不多见。即使非常近似的天青釉色,钧窑差肩于汝窑,也是现代研究的共识,为什么当时没有人能看出呢!如果说是文献记载有误,那依本文所引述的文献资料,钧窑被“误”记为官窑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以钧窑即是汴京官窑来解释为什么宋元文献中未有钧窑的记载更加合理。因其为京师自置的官窑,文献便不用比较习见的以州名命名窑场的方式,而直接呼其为官窑,这样在当时的文献中自然就不会有钧窑的记载。

5. 钧官窑、汴京官窑共存的不合理性

《垣斋笔衡》:“本朝以定州白磁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⑦据此可知,北宋时,原命定窑供朝廷,后因其有芒而改命汝州造青器供朝廷使用。“天青釉汝瓷创烧于宋神宗元丰年间,大约停烧于宋徽宗前期。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性质是官窑”^⑧。这与汴京官窑“政和间”自置在时间上亦相互衔接。南宋时,先设“内窑”,后“别立新窑”。意即两宋朝廷所设官窑均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废舍一个,再立别个。若禹州钧窑与汴京官窑不为一个,那么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上看,二者存在时间基本同时,不符合两宋朝廷对官窑设置的惯例,甚至是制度。

我们从上述五个方面论述了禹州钧窑很有可能即是汴京官窑,但这个观点尚有几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一,汴京(今开封)辖区窑址的可能所在未全部勘查、发掘,若以后发现了北宋的汴京官窑址,上述观点自不可立。二,现在被认为是汴京官窑的瓷器,并未在禹州发现对应产品,这些瓷器很可能不是当地所出,其所属窑口还需大量的工作验证。三,元以前没有钧窑的记载,可为什么到了明代又出现了呢?很可能是当时在

禹州地区发现了相类似的遗物。据《大明会典》载：钧州为光禄寺烧造过酒缸、瓶坛、酒瓶等^③，业者之间口耳相传，可能会流传一些以前的烧造情况，甚至会发现一些以前生产的瓷片或其他遗物，与宫中相比较，将它们一并作为“钧窑”直接记载。但又不知其原本即为官窑，所以出现了钧、官并列的情形。当然这些问题的解释，尚待更多的资料，更进一步的科学研究。目前，在禹州发现了多处钧瓷系窑址，只有一部分，如钧台窑、刘家门窑烧造颇精，质量上乘，可堪比传世宫廷用钧瓷系瓷器。其余绝大部分窑址，应该是面向普通百姓的民窑址。

（二）年代

如果禹州钧窑即是北宋汴京官窑所在，那么可能作为官窑的钧台、刘家门等窑址的烧造时间还可进一步明确，即文献所载的北宋官窑烧造时间——徽宗政和到宣和年间，即1111~1125年。而其余的民窑址，则会晚一些。正如汝窑受命烧造青瓷之后，唐、邓等州相继仿烧而“悉有之”一样，禹州在出现了官窑之后，附近民窑也会竞相仿造，所以出现时间会晚于官窑的始烧时间。

若上述论述成立，钧瓷系可能是随着汴京官窑的设置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也就是说，北宋汴京官窑、禹州的钧瓷业、钧瓷系三者是同时产生的。

四、结语

“瓷系”的概念较之“窑系”在某些时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适当提倡运用。禹州很有可能即是北宋汴京官窑所在，目前发掘的钧台、刘家门等窑址即应为汴京官窑址。钧瓷系瓷器出现于北宋末年，与原本为汴京官窑的禹县钧窑出现的时间同时，并一直延续至明清。在现有资料的基础上做出的这些论证，还需要有新资料的进一步验证。

- ①④⑦②⑥中国硅酸盐学会 《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2004年。
- ② 秦大树 《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文物》2007年第5期。
- ③ 刘涛 《宋辽金纪年瓷器》，文物出版社，2004年；秦大树 《论“窑系”概念的形成、意义及其局限性》，《文物》2007年第5期。
- ⑤⑩赵青云 《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 ⑥⑪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1期。
- ⑧ 欧阳琛等 《景德镇陶录校注》卷六，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 ⑨ [清]陈浏 《陶雅》，中国书店影印贵山房重刊本，1991年。
- ⑫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洛阳宋代衙署庭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6年第6期。
- ⑬ 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
- ⑭⑮[清]徐松辑 《宋会要辑稿》，蕃夷二之一一，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年。
- ⑯ 刘涛 《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文物》2002年第2期，认为：钧窑的始烧时间应在金代前期，中后期迅速崛起；余佩瑾 《钧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从故宫收藏的钧瓷器谈起》，《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三期，1999年，认为：器皿类器物则始烧于金代后期，陈设瓷生产于14世纪前半叶；李民举 《陈设类钧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认为“钧台窑遗物的造型特征，具有明显的元及明初风格，其时代亦应在此时期，即公元十五世纪左右。”罗慧琪 《传世钧瓷器的时代问题》，《美术史集刊》1997年第四期，认为“钧窑陈设器不产于北宋。其时代应为十四世纪晚期，元末明初。”
- ⑰⑳[元]陶宗仪 《辍耕录》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⑱ [南宋]顾文荐 《负暄杂录》，《说郛》，卷十八，涵芬楼本。
- ⑲ 殷德铭 《北宋京师自置官窑之谜探究》，《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
- ⑳ [南宋]陆游 《老学庵笔记》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㉑ [明]谷应泰 《博物要览》卷二，《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
- ㉒ [明]高濂 《遵生八笺》卷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㉓ [清]梁同书 《古窑器考》，《中国古代陶瓷文献辑录》（二），2003年。
- ㉔ [清]刘体仁 《七颂堂识小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㉕ [清]唐秉钧 《文房肆考》卷三，《故宫珍本丛刊》，海南出版社，2000年。

（下转第103页）

动、具体的展览推陈出新地呈现给观众。安阳市民间艺术博物馆是河南省仅有的一家从事民间艺术专项保护研究的博物馆。自成立以来在对本土的民俗风情技艺、礼仪信仰传说、民间特种工艺等人文概况进行普查、征集、收藏的基础上,有效地进行了一系列的保护研究及展示工作,共收集和展示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艺作品上万件,组织民间艺术专题陈列展览 200 余届,举办民俗文化庙会 60 余次和民间戏剧保护演出 600 余场,策划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体宣传专题片、专题报道 200 余次,出版了《内黄现代民间绘画》、《汤阴民间剪纸》、《甲骨文剪纸图解》等专题保护研究画册。多年来,通过安阳民间艺术博物馆专业队伍的努力工作,已建立、扶植、培养了内黄县农民画、汤阳县剪纸两个民间艺术基地以及上百人的优秀民间艺术家队伍。一系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展示工作及保护活动的开展,使民间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安阳民间艺术家们切磋交流、展示才艺的舞台,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传承和展示的基地。

其次,加强策划宣传力度,提高自身知名度。民俗类博物馆因其多为近几年来新建,故在同行和群众中知名度较弱,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强宣传力度。群众参观博物馆的过程就是一个陶冶情操、获取知识、接受教育的过程,也是博物馆发挥其社教功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旅游景观和陈列品的讲解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从讲解词的撰写,到全面、准确、细致的实地讲解,再到与观众进行肢体语言和心灵的交流,都需要业务人员的精雕细琢。

再者,民俗类博物馆应加强策划、宣传的力度,以实物教育为标志的博物馆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其他任何形式所不能替代和无法比拟的。这就需要民俗类博物馆办出特色,强化教

育功能,用本民族的、历经千百年的文化传承积淀下来的文物精品来体现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民俗类博物馆要通过策划人员的精心策划,展陈人员的合理布展,美工人员的设计包装,宣传人员的社教推广,向公众展示与综合类博物馆所不同的专题专业特色。安阳市民间艺术博物馆近年来通过积极探索宣传形式,从不同角度、不同形式大力宣传民间艺术博物馆的各项陈展及其业务工作,以特色展览和区别于综合类博物馆的特别功能来提升自身。

最后,灵活机动搞展示,积极服务社会。民俗类博物馆应当经常举办民俗活动,以活动带动展览,以展览促进活动,深入调查研究,关注社会热点,了解观众的文化需求,以区别综合类博物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展示来贴近打动观众,取得展陈与受众互动的良好效果。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打造民俗特色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依托春节、元宵节、中秋节等民俗传统节日以及“5.18”国际博物馆日、“6.12”全国文化遗产日、“7.13”安阳文化遗产日、国庆节等大的节庆活动,举办了一系列的民间绝活现场表演与游客互动活动,受到广大游客的热烈欢迎,并使安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种展示中得到保护和传承。

此外,民俗类博物馆应加强和同行的联系、合作、交流,以合作办展的形式,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因为各个博物馆都具特色和优势,所以民俗博物馆要在保持民俗特色的前提下,扬长避短,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民俗类博物馆前进的脉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局部到全部,做得更好、更专业,真正成为保护“非遗”的卫士。

(责任编辑:黄林纳)

(上接第 88 页)

- ②⑦ 杜正贤、马东风 《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南方文物》2000 年第 4 期。
- ②⑧ [明]曹昭 《格古要论》卷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②⑨ [清]寂园叟 《汝窑托杯行》和《均盆歌》,《中国陶瓷古籍集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 年。
- ③⑩ [明]文震亨 《长物志》卷七,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

- ③① 秦大树、赵文军 《钧窑研究、发掘与分期新论》,《2005 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 年。
- ③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宝丰清凉寺汝窑址 2000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 年第 11 期。
- ③③ [明]李东阳 《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

(责任编辑:黄林纳)